

出类拔萃之辈

戴维·哈尔伯斯坦著

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类拔萃之辈

〔美〕戴维·哈尔伯斯坦著

齐沛合译

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72

根据纽约兰多姆出版公司1972年版译出

出 类 拔 萃 之 辈

〔美〕戴维·哈尔伯斯坦著

齐 沛 合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9.625印张 707,000字

1973年12月第1版

197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3002·140 每部(三册) 3.75元

(内 部 发 行)

第二十二章

约翰逊进退两难

但是，泰勒在西贡的岁月并不是愉快的。他经过多 482 年锻炼，学会了自我克制和遵守纪律，以之作为生活的准则。现在他面临的南越人却是蛮不讲理，邪门歪道，存心不良，贪财好利。这总不见得公平吧；将从共产党手里得到拯救的人总该有点感恩戴德，至少应该知道自己正在得到拯救，而且更重要的，有一种得到拯救的要求。1964年夏天，泰勒作为一个伟大帝国的地方总督坐镇西贡。这个帝国比它的盟友更坚定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美国人反而比南越人更有义务、更心甘情愿去牺牲。这实在太令人费解了。没有共同的事业，没有一致的意见。当共产党已来到城门口的时候，还能容许无政府主义吗？泰勒在国务院的新上司腊斯克打电报给他说，提醒南越人记住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要末团结一致，要末分别吊死。多年来的军队生涯，那里总是有一定的标准和规则：年轻人尊敬上级；发出命令，人人遵守；同样的军服就意味着站在同一边。而现在在西贡，这一切都不算数了，在欧洲平原上同世界第二强大的军队作战赢得的勋

章也不算什么了。同他打交道的这些毛孩子，大部分没有经历过任何战斗场面。样样事情都搞得很糟；2月间以新总理身分突然出现的阮庆，当时美国人把他看成
483 第一个美国式的领导人而抓住不放，结果也证明不是美国式的，而是越南式的，有吴庭艳的短处而没有吴庭艳的长处，神经过敏，疑神疑鬼，不论年长的和年轻的军官都不喜欢他，而且他和他的前任一样，完全被面临的政治问题所压倒。阮庆经常而且日益激烈地同泰勒争吵，以致到泰勒任职末期，这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代表，实际上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弱小的国家里的不受欢迎的人。

事情总是这样的：泰勒是十分讲究组织和纪律的，力图把理性和逻辑性搬到这个阿丽斯漫游奇境般的世界。一次，他向一位文职助手埋怨说，越南人不喜欢他们正在使用的一套宣传计划，要求取消。助手建议说，那就取消吧。泰勒问他，保留这套计划合不合理呢？助手说，合理。泰勒问，这套计划是否健全？助手又回答说，健全。泰勒说：“如果计划又合理又健全，那我们就该保留它。”后来，在一段政府不断更迭的时期，空军中将阮高其上台，泰勒把《纽约时报》的两名记者叫到一旁，对他们说，如果阮高其当上总理，他会交出空军，而空军在任何一次政变中都是举足轻重的力量，因为政府军队与越共不同，不习惯于挨飞机扫射。有一名记者约翰·兰古思对这种说法有点惊讶，问道：“你真的相信他会交出空军吗？那

是他拥有的唯一实力基础呀！”泰勒说，他确实相信阮高其会这么办。兰古思问：“为什么？”泰勒回答说：“因为他答应过我。”

当然，泰勒感到最糟糕的是没有一件事行得通。越南局势好象坐在游艺场里起伏转动的娱乐车上似的——一会儿要增加顾问，一会儿要增加装备，一会儿对南越人施加更多的威胁，一会儿对北方施加更多的威胁。他这个有限战争特别是这场有限战争的设计者，现在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边是有限战争的失败，是扩大战争的威胁；一边是他的虚荣心，是他对美国不会在越南打败的信念，担心一个大国在一支小小的游击军队面前丧失威信，这将是一场大灾难。这一切都摆在他面前了，而他，马克斯韦尔·泰勒，从前一向是能够控制局面的。现在他们大家正在丧失控制。他们原来紧紧依靠的反叛乱策略也在失灵。1964年8月初，泰勒开始拚命寻求出路。既然不能在南方打败越共，就得在别处另想办法，于是他第一次开始改变对轰炸的态度。现在轰炸变成一种可行的办法了；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是出于军事原因而建议轰炸的。（如同威斯特摩兰一样，他对轰炸在军事上的效果是怀疑的，而且他知道，他那种文职上级，是不会采取那些真正的鹰派如李梅、格林、麦康内尔一类人所要求的那种轰炸的。那些人要求的是全面轰炸，他们要消灭对方。泰勒是一个很文明的将军，不能接受这种

484 要求，而他的上级也是很文明的，他不相信他们会允许干这种事；新战略的整个要旨在于避免全面使用武力，不管是核武力还是非核武力。)

泰勒要求轰炸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他过去反对轰炸，是因为不愿让美国对北越使用更大的实力，轰炸就意味着更多的卷入，美国将在南越政府十分软弱的情况下同北越作战。现在他正在改变主意，他在8月18日给总统的电报中说：“今后数月中必须增加某种东西。”所谓某种东西就是轰炸；他建议，报复行动开始的适当时间是1965年1月1日，这是大选后一个方便的时间。理想的做法是，我们应该告诉阮庆，如果他能向美国表明他已作好准备，给西贡带来一个稳定的新时期，我们就开始为阮庆和南越人进行轰炸。这就是说，轰炸是一种政治手段，一种报酬；如果他们表现好，愿意整顿内部，我们就轰炸，表明我们愿意进一步承担义务。当然，十多年来南越领导人学到的一个经验就是，美国反共比他们更为卖劲，而且南越人越输得惨，美国越愿意投入。似乎为了证实这一点，泰勒还在同一个电报里告诉华盛顿，1月1日也许太迟了，那样的话美国不管怎样也得采取行动，只望阮庆会跟上来。

结果，泰勒和鲍尔在是否进行轰炸这个重大问题上对立起来了，但双方提出了同样的事实根据：西贡几乎完全软弱无能和不稳定。还有一条理由可以打动别的人，

即轰炸只是一张牌，打出去不一定会把事情做绝。所有人似乎都认为，河内十分重视它的工业基地，必将尽力保护，包括停止在南方的战争。为什么不试一下，摸摸底呢？至少这可以惩罚河内，这就多少是一种收获；人们感到河内应该受到惩罚，因为河内惩罚了美国和西贡而不付任何代价。在一个四分五裂、举棋不定的官僚机构里，一位强硬的大使具有很大的权力。因此，泰勒的转变是一个把守重要关口的关键人物的转变，他的转变象征着其他参与者也在逐渐转变。这倒不是因为泰勒愚蠢或无能，虽然他远不是聪明人；而是说明他是一个处在绝望形势下的绝望的人，已经走得很远，无法回头。这一点是他们大家的共同之处。

秋天发生的事使泰勒彻底转向轰炸。正如东京湾事件之前的隐蔽行动导致东京湾事件，使美国和他的许多主要官员都感到对方向我们进行了挑衅一样，这一次主要官员们利用了边和机场事件作为触发扳机；边和事件的爆发使他们对敌人深恶痛绝。11月1日，从菲律宾转 485
移到边和机场的陈旧的 B-57 轰炸机中队（国务院曾反对这次调动）受到越共袭击；五名美国人被打死，七十六名被打伤，六架轰炸机被击毁。这就是说，越共同我们是针锋相对的；任何人想知道越共今后对轰炸的态度，可以从这件事得到答案。他们将对南方的目标增加压力，来对付我们的空中力量。

但是，关于边和机场事件，最重要的不是美国存放飞机在那里，不是越共袭击了这些飞机，也不是越南共和国军的机场警卫工作实在太差。重要的是泰勒的反应。这次袭击激怒了他。过去他打给华盛顿的电报一向是克制的，语气几乎是保守的。现在打去的电报截然不同，语气是愤怒的，几乎怒不可遏；他们竟敢对美利坚合众国的象征作出这样的事，而他作为大使，则更是伟大的象征。对方竟敢摆出狂妄自大的姿态来戏弄巨人！他要求报复，立即报复。当时离开大选只有两天了，约翰逊没有答复泰勒的要求。泰勒感到惊讶，甚至有点恼火，公开向大使馆里的朋友和新闻记者发牢骚。但这件事突出地把他推向主张轰炸。从此以后，他就卷了进去。他对河内很恼火，极力想惩罚它。他不仅要求针锋相对的报复，而且要求制订一项大规模轰炸的计划，理由是这可以振奋士气，扩大我们在南方的影响，因为南方现在需要准备承受来自北方的更大压力。如同另外一些主张轰炸的人一样，泰勒的态度并不是特别出于相信轰炸之有效，而是出于“为什么不炸”这种想法。无论如何，这可以为西贡争取时间；我们并不想接管这场战争。

但是 1964 年深秋泰勒的转变，对政府机构内部主要官员影响很大。连泰勒都可以上马，主要官员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它只是更加证明他们必须走这条路。但是，除了泰勒的心腹威斯特摩兰外，大使馆高级官员中还有

一位重要人物对轰炸抱有很大怀疑。他就是中央情报局驻西贡的站长皮尔·德西尔瓦，他是西点军校毕业生，朋友们却认为他对军方有一种几乎是病态的不信任。他准确地预言，轰炸除了引起河内派遣更多的部队从小道南下外，实际上不会有什么效用；河内不会搞传统军事意义上的入侵。这个预言颇不寻常，因为军方在1964年仍然假定，如果北方参战，它将以师团列队的传统方式南下，给美军提供很好的目标。《纽约时报》的罗伯特·克莱曼于1965年2月访问一些将军时，问他们河内会干什么。486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位成员对他说，如果北方南下，需要“如同在朝鲜一样，用八个美国师”制止他们，而我们也不必考虑事先把美国部队派进去，因为我们可以搞空运，比北越从地面开过来的速度还要快。一个在西贡搞过军事的文职人员估计，需要四个师；西贡司令部的另一个高级官员说，要两个师；而一个在西贡的高级计划人员则说，一个美国师就够了，然后又预言说，“我认为他们不会那样干。实际上，我们刚收听到一则广播消息，说他们如何调动了一个师，把它分散成零星小股，然后渗透到南方，再重行集结起来。我认为他们不会采用朝鲜式的南下，地形根本不对头，沿海是狭长的平原，没有良好的道路——他们根本不可能搞大规模常规进军。”

泰勒虽然建议轰炸，他也知道轰炸本身是不够的，如果轰炸的话，就得需要地面部队。但他对派遣战斗部队

是有顾虑的，除非非派不可，否则他是不愿意那样干的，原因之一是美国人参加一场涉及政治的战争会引起问题，驱使人民倒向越共一边，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感到存在一个转折点，即如果美国投入人力，南越人就会更加消极怠工，从而加速战争美国化的过程。这就是1964年秋天使他感到很烦恼的问题。他提出：“普氏线”^①在什么地方？七万五千人，十万人，还是十五万人？达到什么程度南越人就会躺倒不干，让我们接管，从而需要派遣更多美国人？但是，尽管这件事使他感到烦恼，他仍然深信不管发生什么事，他还是能够影响美国的决定，必要时他可以刹车，他作为大使是处在关键地位的，而威斯特摩兰多少是在他的羽翼下，也就是说在他的控制之下。在这个幻想的影响下，泰勒同后来其他主要官员一样相信他们能够控制事态和决定，左右和遏制事态的发展。可是事态的发展并非完全如此：在南越没有美国军队的情况下，他作为大使自然是首要的美国人；一旦部队到达，这出戏就归威斯特摩兰来唱了。

尽管派多少部队的问题使泰勒烦恼，他对自己限制部队人数的能力还是有把握的。1964年11月底，正是感

^① “普氏线” (Plimsoll line)——即船只正常吃水线，是英国政治家塞缪尔·普利姆索尔 (Samuel Plimsoll, 1824—1898) 提出的反对船只装载超重的法律。普氏线或普氏标就是英国商船外面标出的法律许可的吃水线，过此即超重。这里是借用。——译者

感恩节前夕，泰勒准备返回华盛顿。由于总统已经靠自己的努力当选，将在华盛顿作出某种重要决定。泰勒在这次重要旅行之前，在西贡召集高级下属开了一次会议。一个在场人物认为，那是一个重大的时刻，泰勒知道这一点，却好象比别人表现得更超然的样子。他站在那里，漂亮而矜持，他穿着普通便服，然而他那上将的四颗星似乎隐约可见。他这位“决不再干俱乐部”的创始成员之一，向他的高级下属们说，“我将去见总统，并且向他建议，按照目前事态的发展，我们这里需要美国的地面部队。不管怎样，我准备向他提出这一点，但我想如果我告诉总统你们大家都同意，那会有所帮助，可以使我的主张更为有力。但是，我想我应该提醒你们，我们最后可能需要十万人之多。” 487

1964年11月3日的选举结果，正如约翰逊所希望的那样，也许还更好一些。他得到四千三百万张选票，而戈德华特只得到二千七百万张选票；约翰逊得到61%的选票，是任何一位美国总统从未得到过的最高百分比。他在国会也取得多数，在众议院多得了三十七席，在参议院民主党人得到六十八席，占很大优势。他小心地掩盖了越南问题，把它从辩论中、从公众的视线中、从新闻界的视线中挪开。（白修德为1964年大选写的采访报道集，题为《1964年总统的产生》，它由于有关主要问题和人物

的背景材料丰富而闻名。他的报道很能说明问题：书中十八次提到比尔·莫耶斯，十四次提到肯尼思·奥唐奈，这两人都曾为约翰逊当时的竞选活动效劳，而根本没有提到威廉·邦迪和约翰·麦克诺顿，他们当时正肩负着准备战争的重担。马克斯韦尔·泰勒作为美国大使，是驻在西贡的关键人物，却只提到过两次。这并不反映白修德的新闻工作能力有问题，而是反映了约翰逊把战争问题同竞选活动分开以及隐藏决策工作的能力。)然而越南问题并没有消失；正当总统还处在大选狂热的最后几星期中，兴高采烈，接受一位政治人物很少得到过的那种奉承的时候，政府机构已经在有条不紊地拚命工作，作好准备。在边和机场遭到袭击时，主要官员们就已准备要轰炸了；要求采取行动——几乎任何行动都行——的压力不断增长。几乎紧接着大选之后，他们就转向决定轰炸。11月8日，腊斯克打了一个重要电报给在西贡的泰勒说，工作小组正在紧张地准备新的方案，替代目前的政策。他说：

我们目前倾向于公开地和不公开地采取一项更厉害的政策来对付他们。我们打算很快就决定，如果河内还不改变立场，我们在采取谈判行动的同时，将在1月份开始对河内采取缓慢推进的作战行动。这种行动将不象全面进攻那样剧烈。工作小组正在把一切准备就绪。

腊斯克要求泰勒就西贡方面的情况发表意见，意思

是当采取轰炸的时候，西贡也要整顿就绪。他还敦促泰勒向南越人强调团结一致的重要性。11月10日，泰勒答复腊斯克，一开始就提出一个咬文嚼字的问题：

在我们卷进去之前，我们所要求的政府稳定，其最低标准 488 是什么？我认为是要保持城市的治安，确保重要地区不受越共袭击，以及同我们美国进行有效的合作。我们并不指望在三四个月内这样一个政府就能出现，但在承担战争升级计划必然带来的危险之前，实现这种最低标准的政府，是十分需要的。

但是泰勒又指出，如果得不到这样的稳定政府，我们仍然要考虑袭击北方，“以便对一个垂危的政府用人工呼吸来抢救”。至于不稳定问题，泰勒报告说：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过去没有试过的雄辩或劝诱词句。此刻的问题不在政府，而在政府以外的重要集团如佛教徒、天主教徒和政客……

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处在另一端的情报界一样，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时刻。情报界意识到事态正在失去控制，限制正在取消；参谋长们从截然不同的角度也具有类似的感觉。他们认为，一切都越来越成为归他们管的事情，属于他们专职范围，然而正当事态在发展，战斗不可避免地日益迫近时，他们却有点局外人的感觉，无法掌握局面。他们曾经以为自己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的意见和职业专长将会得到重视；总统周围的文职

人员就要让开，参谋长们会进入舞台中央。

但结果却并非如此。相反，他们发现总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不愿意同他们在一起，好象多少有些害怕给人这样的印象，即他正在进入一场热战，因而正在听取军方的意见，受到军方的影响。（参谋长们事后才知道，林登·约翰逊后来在战争降级和需要他们的帮助来保护他免于受右派攻击的时候，是十分愿意别人看到他和参谋长们在一起并且一起合影的；但是在1964年和1965年，他最不愿意人家认为他是在参谋长们的包围和影响之下。）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接近一场真正的战争，却越来越同总统疏远。他们当中有些人开始感到，这将再度是一场毫无结果的艰苦战争，一场文职人员的战争，而他们军人则将再次被孤立。他们和总统的关系很别扭，主要是因为他们确信总统和他们在一起感到不舒服；他们觉察到总统不信任他们，总想和他们保持一定距离，并且利用麦克纳马拉和泰勒把他们排挤出去。

他们不喜欢和不信任麦克纳马拉（也不喜欢和不信任麦克纳马拉用来同他们打交道的主要助手麦克诺顿，后者更加不隐讳对他们的蔑视），感到国防部长总是在玩弄他们，没有真正把他们的意见反映给总统，尽管他说已经反映过了。他们确信麦克纳马拉在背后诽谤他们，当他同总统谈话时，看来是把他们当作敌人，应该挡开，而且他想方设法不让他们见到总统。（他们对他们说，“这是宪

法赋予你们的权利，不过如果我是你们，我是不会去见总统的。他不喜欢你们去，还是由我代表你们去好一些。”）因此，在总统作出战争升级决定前的几个月中，他们只见到过总统两次。他们当中许多人后来厌恶麦克纳马拉；随着战争的进行和问题日益增多，麦克纳马拉成了他们失望的象征，成了一切坏事的化身。（1966年8月，在林达·约翰逊^①同丘克·罗布的结婚典礼上，麦克纳马拉走到讨厌他的海军陆战队司令沃利斯·格林将军面前说，他感到迷惑，他弄不懂为什么他正在失去对总统的影响。他问道，格林将军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格林暗想，你正在丧失影响，是因为你这些年来一直向他说谎，欺骗了他。但是，到约翰逊任期末尾，格林对这个总统的情绪也差不多是同样的。一个历史学家为林登·约翰逊图书馆要求对格林进行一次访问，格林回答说，可以，如果在录音机里装了耐火的石绵录音带的话。）到1964年夏天，麦克纳马拉信任的将军只剩下泰勒一人，而其他参谋长并不见得信任泰勒，认为他不是自己人，而且泰勒向政客们反映意见并不代表他们，而只代表他自己。参谋长们比较喜欢继泰勒之后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厄尔·惠勒；他们感到他比较诚实，但也认为他被专门玩弄政治的文职人员的问题压倒了。

① 约翰逊总统的长女。——译者

因此，尽管事态正向升级发展，参谋长们却强烈地感到他们是局外人、旁观者。他们是：空军的柯蒂斯·李梅上将、海军的戴维·麦克唐纳上将和海军陆战队的沃利斯·格林（他不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正式成员，但由于他的强硬观点和由于海军陆战队将是首批派去的部队，而成为这一伙人中的重要人物），他们都是强硬的鹰派。空军相信空中力量和轰炸，老式的无休止的轰炸；海军是鹰派，力求证明航空母舰仍然有用，急于参加到目前为止主要是陆军表演的这出戏，发挥作用；格林也是鹰派。他们都是单纯的人，是他们所受的训练、所处的环境和所处的时代的产物，他们相信战争的古老格言：如果要打仗，就得动用武力；如果动用武力，就得尽量使用最大的武力。因此，如果我们要轰炸，必须是对一切可以成为目标的地方进行饱和轰炸，目标由参谋长们挑选决定。一句话：彻底消灭敌人。

但是，他们越临近决定，越感到它将只是小心翼翼的、不充分的、半心半意的轰炸，开始的时候是缓慢的，然后逐步升级。这和他们所有的主张都是背道而驰的，它
490 等于告诉敌人，更多的打击还在后面，使敌人可以转移物资，保护自己，从而减少他们的损失，增加美国的损失。所有的参谋长都主张采取重大的轰炸行动，李梅和格林最咄咄逼人；他们还要求轰炸水利大坝，袭击一切。如果说，不值得这样轰炸，那么这个仗也就不值得打。如果派